



费希特
青年时期的
哲学创作

梁志学 著

责任编辑：程志民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式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
FEIXITE QINGNIAN SHIQI DE ZHEXUE CHUANGZUO
梁志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ISBN 7-5004-0871-4/B·176 定价：3.20元

前　　言

从1986年1月开始，到1988年3月截止，沈真同志、李理同志与我翻译了费希特在1792至1794年期间发表的五部重要论著，它们编入了《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在编译这卷的过程中，我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把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成长过程介绍给我国知识界的追求真理的青年朋友们，向他们说明我们科学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应该以继承了费希特而感到骄傲。

但是，作者在着手这项工作时很快就察觉到，要全面地、详尽地评述青年费希特的思想成长过程是自己在近期内无法做到的。例如，他在当家庭教师的时期写过一本《错误教育目睹记》，对于这本涉及许多教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我在目前还不可能作出内行的评论。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课题限定在青年费希特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上。在加了这样的限定以后，我也应该向读者声明，本书对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加以评述的，主要是他当时发表的重要哲学论著和在这些论著中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至于他那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曾经发表过的短文，也只能扼要指明它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占有的地位。

作者在评述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第一，费希特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各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代，费希特参加的那场由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革命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在理论上的表现，因此，青年费希特在自己的哲学创作道路上取得的任何重要成果都应该被看作是促进这个时代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第二，康德的学说是在法国革命尚未爆发的时期形成的，费希特的学说则是法国革命激烈进行的时

期形成的，因此，无论是谈到费希特把康德哲学发展为一个彻底的哲学体系，还是谈到费希特比康德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社会政治结论，都应该认为这不仅是德国哲学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而且是当时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上的升华。作者的这两条要求在本书中贯彻得如何，请青年朋友们加以评判。

关于本书的表达方式，作者也应该作出说明。大家知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以后，德国封建专制当局逐步采取了种种钳制言论自由的反动措施。这就使得德国的哲学家们难以用明快的语言去表达那些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因而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总是使用一种晦涩难懂的语言。费希特青年时期的著作也是如此，甚至于他的匿名著作也有暗示的笔法。这种情况给作者评述他的思想带来了不少困难。在许多场合，作者必须首先对引文作出必要解释，然后才能进行分析。因此，本书在不少地方写得还不够简捷明快。作者决不想把这个问题完全归咎于自己论述的对象，而是想把它提出来，以便今后找到更好的处理方法。

在作者研究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的过程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研究所赖因哈德·劳特教授按照我提出的要求，及时地赠送给我许多亟需的图书资料，并且在1989年5月至7月给我到该所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对于他给予我的这些巨大支持和帮助，我要向他致以衷心的谢意。同时，我还应该说明，我在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吸取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曼弗里德·布尔教授研究费希特的许多成果，并且在我们最近五年的学术交往中，他也同样给予我许多帮助，因此我也要向他表示感谢。

本书初稿写出后，曾经请沈真、程志民与谢地坤同志传阅过。他们对初稿提出不少改进意见，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本书之写作曾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梁志学
北京，1989年9月

目 录

前 言.....	(III)
第一章 青年费希特哲学创作概论.....	(1)
第一节 康德哲学研究与法国革命影响	(2)
第二节 知识学体系与天赋人权论.....	(7)
第二章 阐述增进道德的理性神学	
——《试评一切天启》	(16)
第一节 这部论著的产生过程	(16)
第二节 这部论著的基本内容	(20)
1. 从上帝概念推演出天启概念	(21)
2. 在实践理性法庭面前评判天启概念	(27)
3. 确定合理应用天启概念的条件	(33)
第三节 这部论著的理论意义	(38)
第三章 维护探索真理的天赋权利	
——《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	(42)
第一节 思想自由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	(45)
第二节 思想自由是不容压制的天赋人权	(48)
第三节 君主们必须尊重真理和服从真理	(59)

第四章 回答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

——《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	(63)
第一节 当时德国的社会思潮	(64)
第二节 对法国革命提出的根本问题的回答	(71)
1. 评判法国革命必须从什么原理出发?	(71)
2. 人民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国家宪法?	(81)
3. 改变宪法的权利可以通过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 出让吗?	(90)
4. 为什么劳动人民有权摆脱封建剥削?	(100)
5. 为什么国家必须废除贵族特权?	(106)
6. 应该怎样处置封建教会?	(113)
第三节 公众的不同反应与作者的自我评价	(125)

第五章 制定自己特有的哲学体系

——从“评《埃奈百德穆》”到《论知识学的 概念》	(132)
第一节 知识学体系的发端	(132)
第二节 知识学体系的意义	(145)
第三节 知识学体系的纲领	(153)

第六章 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若干演讲》	(164)
第一节 从自我与物体世界的关系看人的使命	(166)
第二节 从自我与其他理性生物的关系看人的使命	(171)
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的差别	(176)
第四节 学者的神圣使命	(179)
第五节 文化对人类道德的影响 ——评卢梭否定科学和艺术的主张	(184)

第一章

青年费希特哲学创作概论

费希特从1790年8月开始研究康德，到1794年5月在耶拿大学任教，在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内容的探索。在这段时期，他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回答了怀疑主义的挑战，建立起了自己特有的知识学体系；在这段时期，他以自己坚持的理性主义为依据，肩负着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宗教和道德问题、国家和法律问题作出了严肃认真的和发人深省的回答。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时期。

我们要研究的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是他在当年发表的这样一些重要论著：

- 一、《试评一切天启》，柯尼斯堡1792年复活节；
- 二、《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但泽1793年复活节；
- 三、《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第一卷《评判法国革命的合法性》，但泽1793年5月与1794年2月；
- 四、“评《埃奈西德穆》”，耶拿《文汇报》1794年2月1日与12日；
- 五、《论人的尊严》，魏玛1794年4月；
- 六、《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魏玛1794年5月；
- 七、《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若干演讲》，耶拿与莱比锡1794年9月。

这些论著中的每一篇，或者是在理论哲学方面，或者是在实

践哲学方面，或者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标志着青年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成长的一个阶段。为了便于分别评述它们，我们觉得有必要首先对这个哲学创作过程从整体上加以考察，说明它的源泉和实质。

第一节 康德哲学研究与法国革命影响

对青年费希特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康德哲学和法国革命。在他进入哲学领域的时候，康德哲学几乎变成了德国唯一的话题，康德发起的哲学革命正象哥白尼让太阳静止下来，而让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是要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而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当时德国出版的无数哲学著作都在评论康德，有的表示拥护，有的表示反对，但这场哲学革命的结局如何，还难以预料。与此同时，在莱茵河的彼岸，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攻克巴士底狱的法国人民正在高举着《人权宣言》这个反封建的纲领，投入制定宪法和选举代表国民最高主权的政府的斗争，要求废除贵族特权和没收教会财产，从而把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一方面大力从事康德哲学研究，试图把康德哲学改造为一个在理论上具备科学形态的、在实践上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深入研讨法国革命进程，试图从哲学上回答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提出的社会历史问题；并且，青年费希特从事的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就象德国哲学革命与法国政治革命都属于欧洲各个主要国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一样，在他的哲学创作过程中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①。

费希特的康德哲学研究是在他偶然遇到一个机会时开始的。

① 参看曼·布尔“费希特的哲学与当时的历史过程”，入《先验哲学思想》，克·哈马赫尔编，汉堡1981年，第331—344页。

在此以前，他虽然也听说康德其人，但并没有读过康德的著作。1790年夏天，他重返莱比锡；他本来想靠从事创作维生，但一切尝试都没有成功，因而不得不再当私人家庭教师。7月底，有一个大学生到他那里，问他是否能教康德哲学。生活陷于困顿境地的费希特欣然接受了聘请，于是他就边学边教，讲授起康德哲学来了。8月12日他在写给他的未婚妻玛丽·约翰妮·拉恩（Marie Johanne Rahn 1755—1819）的信里说道，“请你告诉你的爸爸，我现已开始钻研康德哲学，忙得不亦乐乎，并且我明显地感到此事必须用全部心思去做。我现在正在给一个大学生讲授康德哲学，而这一哲学在苏黎世被人们认为是完全不可理解的”^①。

费希特最初钻研和讲解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加1781年）。他读完此书之后，写出一篇未定稿，即《关于宗教和有神论的箴言》。这篇手稿尽管是以构想一个有神论体系为宗旨，说“这个纯粹有神论的体系并不与基督教相矛盾，而是允许基督教具有全部主观的有效性”，但重点在于探讨康德的必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试图肯定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既有其必然的存在，又有其自由的活动，并且费希特认为康德作为目光敏锐的自由捍卫者“在他的证明中所作的，无非是论证和解释自由概念”^②。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费希特在康德著作中一开始注意的就是自由问题。

然而随后不久，费希特就很快熟悉《实践理性批判》（里加1788年）了。他在1790年8月底或者9月初写给在申韦尔达担任家庭教师的青年朋友弗·奥·魏斯宏（F·A·Weisshuhn 1758—1795）的信里谈到，“自从我研读过《实践理性批判》以来，我就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我过去相信的一些原理，无论多么不可推翻，现在在我看来已经被推翻了；我在过去相信的一些事物，尽管在以前对我来说决不可能得到证明，例如，绝对自由、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8年，第166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2年，第290页。

职责等等的概念，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得到证明。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令人难以言说的是，这个体系多么尊重人性，这个体系给予我们多大的力量啊！”^①不仅如此，他还初步研读了刚出版的《判断力批判》（柏林与李保1790年），认为这部著作比康德以前发表的著作写得更清楚、更精彩。这时，他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变成了把人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需要。在9月5日写给拉恩的信里，费希特进一步具体地谈到：“康德哲学抑制了我的活跃的幻想力，使理智占据优势，使全部精神占据一种君临于一切世俗事物之上的无法形容的地位”：

“它的原理当然是一些令人头痛的思辨，它们对人生决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的结论对于道德败坏透顶的时代却至关重要，而且我认为，向世人通俗阐述这些结论，可以算是对它作出的一项贡献”；“我们过去对一切人类行为所作的研究不管推论多么正确，都毕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辩论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原理。我现在完全确信，人的意志是自由的”。^②

从这个时候起，费希特决意在几年内专心致志地研究康德哲学，撰写阐发它的著作。大约在1790年9月中旬，他写出了一部分简明扼要地解释《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的手稿。接着，他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判断力批判》，到1791年初写出了对这部著作的“导论”和第1节至第16节的解释。这部原拟发表的手稿《康德〈判断力批判〉摘要解释》虽然没有完成，因而未能出版，但它对青年费希特并非徒劳无益。他在1791年3月5日写给其胞弟萨缪尔·哥特海弗·费希特（Samuel Gotthelf Ficht^e
_{1771—1800}）的信里说道，“我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康德哲学的著作，它虽然没有完成，所以不可能公诸于世，但它给我带来了幸福的时刻，在我的头脑和心灵中引起了一场非常有益的革命”^③。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8年，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222页。

正是通过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把握了批判哲学的真谛，费希特才有可能在1791年夏天写出一部发展康德思想，维护理性尊严，主张除恶扬善的宗教哲学著作《试评一切天启》，从而在德国哲学论坛上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也正是通过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费希特才有可能在哲学创作中接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对它作出不同凡响的反应。而关于法国革命构成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的源泉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点：

第一，接受卢梭为法国革命做过准备的理论，用以抨击腐败的封建专制社会。还在法国革命爆发的前夕，青年费希特就阅读过卢梭的著作，并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不眠之夜偶想》（1788年）。在这篇著作中，费希特指出，当时欧洲各国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尤其是对种地的农民阶层进行专横统治和残酷压迫”；他揭露了最高封建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尽情享乐的罪恶行径，他说“宫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增加君主的收入”；他揭露了封建贵族阶层依靠手中特权，鱼肉人民的黑暗现实，他说“那种认为贵族是人民权利的支柱的论断是极其可笑的”^①。卢梭给法国革命准备的理论已融化到了青年费希特的体系中，所以，在《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若干演讲》里费希特还对卢梭表示了莫大的敬意，说“他在反对普遍道德败坏的斗争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人们将对他永志不忘。他是有功劳的。许多人继承了他所开创的事业，他在他们的心灵中燃起了烈火”^②。

第二，费希特在苏黎世当家庭教师的时期，对于当时爆发的法国革命就表现出了浓厚政治兴趣。他不仅读过大有关法国革命的书刊，而且还经常与朋友们议论那里发生的事情。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就不断地把他接受的这场革命的政治影响用文字表达出来了。他匿名发表的《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2年，第103—104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3卷，斯图加特1966年，第66页。

思想自由》就是一个反响。从政治上说，这篇著作是在《人权宣言》宣告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以后，鼓动德国人民为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斗争；是在法国人民废除君主立宪政体以后，敦促德国君主们立即进行社会政治改革。从哲学上说，这篇著作是以康德哲学阐明的意志自律或意志自由为基础，对人的天赋权利和社会契约作逻辑演绎，说明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君权来自民权，从而证明封建君主专制的非法性。虽然费希特当时还寄希望于德国实行从上而下的逐步改良，但这也不过是他的实践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极其短暂的阶段而已。

第三，当法国革命向着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主义发展时，费希特与那些被革命的后果吓得哑口无言、退避三舍的人们相反，如饥似渴地从这一革命实践中汲取了大量营养，经过加工改造，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哲学创作。他匿名发表的《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在政治上，对法国人民那种在废除了君主立宪政体之后为确立人民主权而进行着的英勇斗争，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在哲学上，这部著作以康德哲学中的实践自我为基点，结合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正确原则，批驳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各种论调，论证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合理性。在法国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甚至使生活在德国的费希特得出结论说，为了捍卫人民的合法权利，可以对那些反抗的贵族和教士使用革命暴力。这就是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做出的一个最正确、因而也最革命的实践哲学结论。

法国革命的影响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在青年费希特哲学创作中的结合，又是逐步发展的。这可以拿他的两本著作来说明。在《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里，他是从康德讲的自我出发，推演出人有思想自由的天赋权利；他只是在言论自由这个建立繁荣昌盛社会的先决条件问题上，把康德哲学研究与法国革命提供的经验结合起来；他依据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但并没有加以发挥，他看到了法国人民勇敢的创举，但并没有深

入反思。与此不同，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里，他则在法国人民的这一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面前，着重发挥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思想，把能动的自我作为评判是非曲直、回答时代已提出的根本社会政治问题的准则。在这部著作里，费希特要用康德哲学原理去研讨的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诸如人民修改自己的国家宪法的权利、废除封建剥削的根据、取消贵族特权的必要、没收教会财产的措施和实行革命恐怖的意义，而在研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所依据的那个能动的自我也就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同时，费希特在法国革命提供的经验面前，还对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采取了批判地吸收的态度，从而为自己行将建立的哲学体系做了一项必要的理论准备工作。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费希特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营养越多，他在康德哲学研究中获得的成果就越多，反之亦然。所以，这两个来源在他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过程中是相得益彰的。

第二节 知识学体系与天赋人权论

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有两项基本内容，一项是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建立自己的知识学体系，另一项是对天赋人权论进行加工，使之成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这两项基本内容就象上述两个来源一样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为了便于理解，也可以分别加以评述。

在费希特那个时代，一切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都有一个重要缺点，那就是它只强调从客体到主体的必然性，而忽视了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因此，它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只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忘记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德国哲学革命的开创者康德看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认为从主观到客观的实践理性高于从客观到主观的理

论理性。费希特在开始研究康德时就特别重视并且逐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1790年11月份写给他的青年朋友亨·尼·阿赫利斯（H·N·Achelis 1764—1831）的信里说，“康德哲学、特别是它的道德哲学部分——但这个部分，如果不先读《纯粹理性批判》，是无法理解的——给予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我的整个思维方式中产生的革命，真是罄竹难书。我应该向您承认，我现在由衷地相信人是自由的，并且看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职责、美德和整个道德才可能成立”；“我还进而明显地看到，那种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必然性的原理给社会造成了非常有害的结果，所谓的上等阶层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即源出于此”^①。在青年费希特看来，那种主张从客观到主观的唯物主义体系会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现实都有其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的结论，反之，康德强调从主观到客观的先验哲学思想则会得出人有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的合法权利的结论，因此，他从进入哲学领域之日起，就朝着这条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

在费希特生活的时代，真正了解人的革命实践活动，正确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新唯物主义体系还没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旧唯物主义体系的缺点表示不满，而在反对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把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视为能够使人民获得解放的思想体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当时关于宇宙发展史作出的假说还没有发展为真正科学的理论，因此，在那种情况下人们究竟选择什么哲学体系，在很大的程度上还缺乏验证不爽的自然科学论据，而是象费希特说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②。所以，费希特出于批判腐败社会的良好动机，采取了从主观到客观的哲学路线，也有其无可厚非之处。

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青年费希特要建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识学体系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体系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8年，第192—194页。

②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4卷，斯图加特1970年，第195页。

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青年费希特的哲学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大家知道，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要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力图使二者结合在一个体系中。他一方面假定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感觉印象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则认为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及其知识形式的基础是自我，因此，尽管他也强调过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自在之物与自我的二元对立毕竟造成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水分流。费希特在1793年秋季以前，主要是依据自己接受的康德哲学观点，从事于有关宗教与社会政治的研究工作，对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还没有来得及考察。在遇到这类问题时，他不是复述康德的思想，便是作出来自其他哲学传统的解释。例如，在《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里，他说“我们的表象与自在之物从来都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①，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又如，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里，他用亚里士多德讲的形式因和质料因来解释劳动产品的构成时，一方面说产品的形式是由自我赋予的，另一方面则说“上帝是原始质料的所有者，他授予我们这些质料”^②，这就不属于康德的说法了。他也知道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卡·莱·赖因霍尔德（K. L. Reinhold 1758—1823）将意识命题确定为最高原理，以取消自在之物，克服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但他对这位批判哲学的合法解释者所作的尝试，并没有认真地考虑，也没有感到这个尝试与他本人强调实践理性会有什么矛盾。只有到了1793年秋季，当他读到批判的怀疑主义者戈·恩·舒尔策（G. E. Schulze 1761—1833）向自己崇拜的康德与赖因霍尔德发出挑战的《埃奈西德穆》（1792年）的时候，他才强烈意识到，康德的批判哲学有待于进一步改造和加工，建立为一个首尾一贯的严密体系，而赖因霍尔德用一个属于理论理性的意识命题去

①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1卷，斯图加特1964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269页。

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也确实应该受到舒尔策向他提出的那些正确批评。青年费希特当即投入了改造康德哲学和纠正赖因霍尔德的尝试的艰巨工作。经过紧张奋战，他终于写出了“评《埃奈西德穆》”的书评。这篇文章在他的知识学体系的形成中具有奠定基础的意义。它肯定了舒尔策对于赖因霍尔德的批评有助于批判哲学的发展；它捍卫了康德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把康德哲学建立为一个科学体系的任务；它第一次把本原行动（即产生一切行动的行动）确立为哲学体系的最高原理，而这就预告了他将以实践理性克服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方向。他按照这一方向努力的重要成果，就是他在1794年4月写出的那篇标志着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的论著《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

费希特建立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识学体系是以取消自在之物，克服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为代价的。他并不真正了解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与基于这种规律的自由行动的辩证关系，相反地，他认为康德讲的自在之物在知识过程中是主体活动的一个障碍，在社会生活中简直象封建牢笼那样可憎，因而必须加以消除。最能代表这一看法的，是他在1795年4月或5月写的这样一段文字：“我的体系是第一个自由体系；正象法兰西民族使人摆脱了外部枷锁一样，我的体系使人摆脱了自在之物、外部影响的枷锁，在自己的第一原理中把人视为独立不倚的存在者，而自在之物在一切以往的体系中，甚至在康德的体系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人束缚起来”^①。在这里，撇开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不谈，就取消自在之物而言，知识学体系的建立在德国哲学革命中确实是一种退步。但是，退步同时也是进步，因为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受到抑制，必然会使其他方面获得长足进步。知识学体系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情况也是如此。首先，康德力图调和不可调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2卷，斯图加特1970年，第298页。

和的原则，他既缺乏一个统一的最高原理，也没有一个自洽的严密体系；与此不同，费希特自觉地吸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古典公理学方法，先设定一个唯一的最高原理，然后通过严格的逻辑推论，循序渐进地得出其他的公理和一系列的定理，最后又复归于据以出发的起点，从而构筑起一个具有科学形态的哲学体系。这是一个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它对德国古典哲学随后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次，在康德哲学中，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还是有一个共同来源，这被认为是任何人无法知道的，他只满足于假定二者各自独立和相互对峙；与此不同，费希特虽然取消了康德讲的自在之物，但他讲的能动自我又设定了一个非我，认为这样的客体与主体具有互为存在前提、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在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框架内猜测到了理论理性对于实践理性的依从关系，猜测到了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这个辩证法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随后的发展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最后，在实践哲学中，康德用一种反映德国市民渴望获得解放的思辨方式，论证和歌颂了人的意志自由，费希特则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要求把自由意志变成一种战斗力量，论证了人民获得解放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性；康德悬设了一个理想国，说人在其中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希望立法者在建立国家制度时加以参照，费希特则认为一切违背人的终极目的的政府都是非法的，论证了人民有权修改自己的国家宪法；康德认为假定上帝的存在对于达到至善是必要的，费希特则认为上帝是人的主观东西的外化，人应该借助这种外化增强自己扬善除恶的理性力量。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哲学方面，还是在实践哲学方面，知识学体系的建立都具有进步的意义，都带有革命的性质。

对于建立知识学体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另一项工作，是批判地吸收天赋人权论和由此得出的社会契约论。在这里青年费希特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即人类在组成社会以前处于什么状态。天赋人权论者一致回答说，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但是，他们对于自然状